

洪灵菲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36 7080 2

洪 灵 菲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董瑞成

洪灵菲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1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7}{8}$ 插页2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700

书号 10019·3239

定价 0.91 元



作 者 像 (1929 年)

曼妹：日昨幸上一玉諒邀

青覽月明如雪孤照無眠鏗細於豆坐對有恨
往事如煙回首都成幻夢來日似海低頭頓增
淒涼試思竹山故居淚痕笑聲何日再到認取
低徊白石窮輝孤憤酸情幾時和君細語是
用獨坐垂淚望天半似泣之雲踽步愴神聽
外如訴之雨君家堅貞嫺靜性行惇溫容地
卧病得君如對安琪天涯涕淚相逢情同骨肉
有規善之雅有問課之樂忘者毀之妬者譏之而
梅花清骨不因是減其皎潔處士高寒更以此增
其幽福更於相期乎大銜鋒臨陣拼此生以為人類
詎乃同遭危險臨水登山於斯時暫作詞客耗吳
哀哉然而悲歡離合究尋常事南北東西亦等
閒初願共努力假輒相思望勿悲戚遲當把晤
惶愚尺素難寫胸臆伏望珍重玉以為慰

沈菲頓首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作者手迹

出 版 说 明

这本选集收入了洪灵菲烈士的十篇作品，共分两辑。第一辑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流亡》；第二辑是短篇小说《在木筏上》、《在洪流中》、《路上》、《归家》、《金章老姆》、《气力的出卖者》、《柿园》、《家信》和《蛋壳》。各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流亡》选自《洪灵菲选集》，一九五一年七月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

《在木筏上》、《路上》和《归家》选自作者的短篇小说集《归家》，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在洪流中》曾收入短篇小说集《归家》，这里的一篇是选自蒋光慈编的多人集《失业以后》，一九三〇年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金章老姆》、《气力的出卖者》和《柿园》选自作者短篇集《气力出卖者》，一九三〇年三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

《家信》选自《拓荒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出版）、第二期（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出版）。

《蛋壳》选自《现代小说》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文内括号中注解是作者所加；脚注是编者所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80年10月

忆洪灵菲烈士（代序）

洪灵菲同志原名洪伦修，辈序名树森，曾用名洪素佛、李铁郎、林曼青、林荫南等。一九〇三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名洪砂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是个落第秀才，后转业学中医，发明了好几种丸药，在南洋一带销路很好，因此家庭经济情况渐渐好转。父亲为人严正耿直，生性仁慈，以助人为乐，乡里近邻如有困难，不但瞧病不收诊金，有时连医药费也不收。因此病家莫不感其为人善良。

可是他对灵菲非常严厉，灵菲见到父亲，躲得远远的，万一被叫到，则低头无语，温顺得象只绵羊。据灵菲同志告诉我，他父亲特别迷信风水，喜看相问卜，他说灵菲好读书，不是长命的人。灵菲的一举一动，他老人家看来，没有一处顺眼。例如灵菲读书或朗诵诗词，就说音调哀怨凄楚，不是吉兆；灵菲写字，本来很端正利落，却说笔划好象骨头，没有肉，不饱满，是短命相。

母亲系农家女，粗识文字，性情极温婉慈和，能吃苦耐劳，治理家务有条不紊。

灵菲同志有兄二、姊一、弟一，在弟兄们中，他排行第三。因为弟兄众多，家境贫困，灵菲同志幼年的生活，十分艰苦。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到我十五岁时，还没有单独吃过一个鸡蛋。我向母亲要求多分给我一点，母亲总是这样的劝我：‘森儿，你要好好的念书，将来有本事，会赚钱，什么都有得吃。’”从这里就可以知

道灵菲同志幼年的物质生活是十分困窘的了。但这正养成他后来勤俭朴素的美德。

灵菲同志四、五岁时，便被母亲分配做儿童所能做的事。每天早上，天刚微亮，便帮助哥哥到村外去拾猪粪，捡蔗渣，前者当作肥料，后者当作柴烧。他们常常受地主的欺侮、恶骂和毒打，嫌他们脏、臭，不应该从他们门口走过。灵菲回家时哭诉于母亲，母亲则忍气吞声的安慰着灵菲说：“好孩子，不平的事多着哩。咱们是穷人家，他们有钱，有势，谁敢惹他们呢？惹着他们，还不是咱们吃亏。官府还不都是为他们说话的？”在灵菲单纯稚弱的小心灵上，已感到这是极大的耻辱和不平，内心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灵菲同志生长于穷乡僻壤，一直到一九一二年，他九岁时，才进入乡村小学。一入学校，便专心致志地读书。由于屋少人多，仅有的两三间小破屋，十分嘈杂拥挤，他便悄悄地一个人溜到屋顶去学习。当时人们即称他为书呆子。一九一八年灵菲同志从小学毕业，考进潮安县金山中学。

灵菲同志身体瘦长，文质彬彬，不象农村出身的人那么粗壮结实。在瘦棱棱的脸孔上，长着一对特别乌黑明亮的圆眼睛。待人接物很诚恳真挚，体贴入微，又能舍己为人，生性豪放爽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很喜欢他这种性格，爱和他在一起聊天。虽然他是这么瘦，却十分矫健，这跟他爱好体育活动（特别爱踢足球）是分不开的。

中学毕业后，一九二二年升学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前身）。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高师，是郁达夫先生最喜爱的一个高材生。

从小学到高师二年级的这段时间，灵菲同志的生活比较

平静，使他能醉心于文艺的研究。他崇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苏曼殊和雪莱、拜伦等几位国内外有名的诗人，喜欢读他们的诗和词，不管是在道上漫步徘徊，或在阶前庭院憩息，他喜欢高声朗诵，旁若无人。

当灵菲同志在高师二年级时，家里忽然给他定下婚约，使他失去了在中学时期多年相爱的女友。虽然他经过一度的反抗和斗争，结果仍被封建势力压了下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目不识丁的农女结了婚。他从此更不想回家了，他父亲也更不喜欢他。他想借酒消愁，在醉中求得解脱，有时喝得过量，一连昏睡两三天不能起床。他内心的痛苦由此可以想见。

这时家里不给他寄钱，他便自己写文章，到处投稿，维持生活。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第一次写的是一篇短篇小说，题为《一个小人物死前的哀鸣》，署名洪素佛，寄到香港日报去发表，后来刊登出来，署名不变，稿费却被人窃取去了。”

到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革命高潮如洪流般地到处奔腾澎湃，灵菲同志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渐渐朝着革命的路上走，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消极、悲观、失望、颓废了，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心情舒畅，大有作为的青年。他的变化跟许苏魂同志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许苏魂同志，原名许统绪，牺牲时名许进，出身于小店员，由于家境贫困，青少年时期没有上过正规学校，靠自己勤奋努力学来一身本事，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家庭生计，到过南洋，对于海外的情况很熟悉。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任海外部秘书长，还负责广东省委的工作。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我们听说，他在一九三〇年赴上海参加全国苏区代表大会时，中途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

许苏魂待人很和蔼可亲，没有旧社会那种旧官僚的习气。他非常喜欢灵菲，爱他的聪明能干，有学问，落笔成文，善于处理事物，但深为灵菲的失恋抱不平。他痛恨旧社会、旧制度。为了婚姻不自由，不知牺牲了多少男女青年。他鼓励灵菲同志，一定要坚强起来，另找志同道合的伴侣，不能那么软弱下去，以自杀了事；必须反抗到底，推翻整个吃人的旧社会、旧制度，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应该做的事。

当时灵菲同志和他一道在海外部工作，受他的领导。灵菲担任组织科科长，兼做党的支部工作。一九二四年灵菲同志加入党，他还和许苏魂同志一同负责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的工作。继省港大罢工之后，一九二六年广州沙基惨案发生，他经常出现于各种群众大会，做宣传、组织等工作，发动反帝斗争力量，从此灵菲同志便一心一意的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直至后来英勇牺牲。

我和灵菲同志的认识，约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那时我刚从潮安韩山师范毕业，来到广州升学，经姚师宝猷（我在福建集美美女师时的史地教员）的介绍，知道许苏魂同志的家眷在此，我才寄宿于许同志的家。许同志夫妇俩待我很好，我们都是同乡，又是同志，每天一道吃饭，一道谈心，亲如一家。在许家，我第一次见到灵菲同志。

后来苏魂同志要灵菲同志帮助我，经常给我谈谈革命的道理。他们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以后，都不主张我报考中山大学，要我到何香凝同志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于是我考进了妇女运动讲习所，见到了一九二五年革命军东征潮汕胜利时曾随军到韩师讲演的邓颖超同志。她还领导过我们金、韩二校最高班的女生，组织成立潮安县第一届妇女解放协会。当时，她是我们讲习所的妇女运动史的讲师。在她的教导下，我对革命有进一

步的认识。是年秋，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同学许珉仇和同乡洪灵菲两同志的介绍下，经过六个月预备党员的考察，终于在一九二七年春初，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我心里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从此我便一心一意地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不管后来白色恐怖如何残酷，始终没有动摇过我的革命意志。

在妇运讲习所毕业后，我被党分配到中央海外部担任文书工作。时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彭泽民部长、许苏魂秘书长以及我们妇运所长何香凝等，都随政府第一批迁都武汉。我们这些留守广州的，等候通知，再行出发。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继上海“四一二”之后，这个阴险毒辣、嗜杀成性的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反革命事变，破坏国共合作，以便独吞革命胜利果实。从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革命团体，清洗、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是日清晨一点多钟，全广州市内外的老百姓正在酣睡中，蒋介石下令戒严，全城顿时布满军警，到处搜查、追捕，枪杀成千累万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好领导、广东省委的负责人萧楚女同志，就在这天被逮捕杀害。据说反动派用木夹把他从市内大东路拖到长堤海珠公园之后，已是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危在旦夕，但敌人还不放过他，又用酷刑将他处死。

事后同乡友好前来告诉我们，四月十五日一早，敌人也来过中山大学两三趟，想逮捕灵菲同志，结果都扑了空，最后把刚进去的新同学许声闻（即许涤新同志）逮走，他正睡在灵菲同志原来睡过的床上。

其实灵菲同志和我，早已得到组织的通知，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春节过后（三月二日）一同搬到距离大东路不远的竹丝岗，一座尼姑庵后边的三间小屋里，这里成了我们

新婚的洞房。除了我的同学谭澹如、许珉仇和一些友好同志外，谁也不让知道，因为估计敌人迟早总有一天要逮捕灵菲同志。

事变之前两三天，灵菲同志正害病，我们都没有去上班，不然，敌人到海外部去抓灵菲，他也难幸免。

事变第二天下午，由尼姑庵的大姑和十一姑这两位好心肠的同情者雇了四辆人力车，扮成要到庙里烧香还愿的样子，将灵菲同志和我转移到白云村——尼姑庵的佃户人家去避难。由于我的短发，乡人感到很奇怪，互相传告，不断有人前来探望。怕因此惹出意外，我们住了几天，又转回尼姑庵来。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们又和当时刚从星洲归国的代表团负责人蔡博真同志以及海外部的陈沧海、张晓天等同志避难到香港，借宿于吴老板的商店和住家。吴老板是我们的同乡，又是苏魂同志的好友，对于我们的招待很周到。

由于吴老板的商店早已接待了海外部主任许超循同志夫妇和苏魂同志的家属，现在又加上我们，来往人多，引起港政府的注意。他们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灵菲、博真、晓天三同志，因为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不象该店的伙计。逮去后，禁锢于香港西捕房。过了几天，查无证据，并经我与香港友好同乡积极营救，始获自由。释放后，由香港政府押送上海轮，驱逐出境，遣返潮汕故乡。船开行后，恐港政府与汕头市府有了联系，灵菲同志乔装为商人，我则模仿富家女儿装束。抵汕后，看到国民党的通缉令刊登于广州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定要抓到灵菲同志。他只得又化装为贫苦农民，剃光头发，赤着足，穿上褴褛的衣服，背上市篮（这是广东一带贫苦农民出洋的装束），只身南渡，到过暹罗、吡叻、新加坡等地。谁知到南洋后，白色恐怖比国内更形严重！亲友们恐受他连累，不敢招待。灵菲同志日则流浪街头，以红薯

(北方叫白薯)汤充饥,夜则栖身公馆墙角。侨居海外数月,备尝辛酸苦楚!

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到国外,灵菲同志便偕戴平万同志(当时平万被海外部派在暹罗工作)一道归国。船抵汕岛,恰好贺龙、叶挺两同志率领的部队刚刚退出潮汕,反动派的军队尚未到来,汕头市一片荒凉,商店紧闭,人心惶惶,惟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一到,人民又要惨遭屠杀、抢劫,路上行人很少。灵菲和平万两同志,只好匆忙离开汕岛,返回故乡,暂时匿居村僻,等待这一浩劫过后,相偕去沪。灵菲同志不但不因此而感到气馁,反而因此增强其对于革命的信心。

是年冬,灵菲同志偕平万同志离开故乡,继续踏上革命的征途,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负责闸北区委书记,与光慈(即蒋光赤)、钱杏邨(即阿英)、孟超等同志认识,并开始写作生活。以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三同志为首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创办春野书店。以灵菲、杜国庠(笔名林伯修)、戴平万等同志为首成立“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创办晓山书店。

一九二八年灵菲同志又兼任地下党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中文系教师。

灵菲来沪后,始闻人言,我已偕姊北上升学,但不知道我的通讯地址,他便写信到北京大学给他在金中时的同学詹昭清,请他转给我一信,要我返沪。

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我由北平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天寒地冻,灵菲同志的衣衫非常单薄,同时也贫困不堪。原来两眼炯炯有神,好象两盏明灯,经过这一年来的流亡生活,奔波了好几万里路程,已精疲力尽,不但眼睛无神,面容瘦削,身体也不象

过去那么矫健。我问他：“生活怎样？”他只是摇头叹息，慢慢才告诉我：“现在已经欠饭馆好几十块钱，没有办法还，借债也已经无处可借，马上就要停止我们吃饭的权利！你说糟糕不？”接着他又说：“只我一个人还不要紧，还有好几位流亡朋友，他们比我更没有办法。最可恨的是书店的老板，好象专门和我们作对。我写了一本书送到他们那里，已经将近两个月了。究竟要不要，也不答复我。好在我的老师郁达夫先生，还是了解我和爱护我，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并介绍我送到‘现代书店’。现代书店答应给我出版；但他们也不是傻子，看到有名作家写序，又看到《流亡》一书所写的内容也是新情况，销路一定不错。书店答应每千字给我四块钱，版权就归他们所有。但贪得无厌的老板们还不知足，他们不愿痛痛快快地付款，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付款日期。现在眼看春节就要到来，需要花钱的事多着哩！几个流亡朋友的生活马上成问题还不说，房东请我们吃年夜饭，难道就不送人家一点礼物吗？倒马桶的工人，辛苦了一年，到春节就不打赏他一点钱吗？这一切，没有钱都过不去！”他愤愤不平的告诉我。

我连忙安慰他说：“别着急，我这里还有一点钱，饭馆的欠款，就由我先付给他们吧，别让他们停伙，停伙就不好办，横竖是个老主顾，有商量的余地，再找新的饭馆，那就更不好办了。”

灵菲同志同意我的主张。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在那样贫困不堪的处境，以苦学生的名义，获得了一笔小小的“都门津贴”助学金，能积下这几十块钱，真是不容易的事啊！灵菲同志很兴奋，很激动，有力地紧紧握住我的手，不知怎样说好。

当时，灵菲同志和几个难友都住在上海法租界白莱尼蒙马朗路西门里的一个前楼，大约十一、二米宽，窗口摆着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一张木板双人床和一张行军床，别无他物。五、六

个难友住在一起，显得非常拥挤，再加上我，更挤得不堪设想了。但是同志们都很客气，让出大床给我们睡，他们有的睡地板，有的睡书桌，有的睡在行军床上。

第二天，我们和房东商量，腾出了二楼的一间亭子间——大约五、六米宽，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可是我们没有钱添置什么，唯一的家具，只是我从北平带回来的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多年失修的破藤箱子。把箱盖放在行军床上，可以作为写作的书桌，把箱子翻过来放在地板上，权当椅子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灵菲同志创作出他的中篇小说《前线》和《转变》。

一九二八年春，《流亡》一书已出版，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带，销路很好。各书店争先恐后要来稿，灵菲同志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也为了担负起流亡同志们和我的生活重担，答应了书店的要求，夜以继日地辛勤写作。

灵菲同志一向很关心同志们。不管自己有没有钱用，一听说同志们有困难，总要设法帮助。记得有好几次，他到外面去接头，听到某某同志生活很困难，马上给我写来了条子，问我身边还有多少钱，要我分一半给他们。

灵菲同志的另一特点是为人谨守信用，与人约会，不管狂风暴雨，准时前往，决不失约，有时直至对方过时不来，才慢步往回走。

为了创作，也为了生活，灵菲同志除忠心耿耿从事于党的工作外，每天起早贪黑地写文章。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〇年春，这短短两年左右时间，灵菲同志共写了一百多万、将近二百万字。单行本有《流亡》、《前线》、《转变》、《明朝》、《归家》、《气力出卖者》、《家信》、《大海》、《长征》（日记体，写上海生活的）及《在淞沪车厢里》。《在淞沪车厢里》是写两个参加过“围剿”红军的

国民党士兵的对话。其他还有些短篇小说和论文、诗歌、卷头语等，散见于《我们》月刊、《太阳月刊》、《海燕》、《拓荒者》、《海风》周报、《大众文艺》、《文艺讲座》等刊物。长诗有《朝霞》、《躺在黄浦滩头》、《在货车上》。《在货车上》是为纪念我们的战友谭澹如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参加广州起义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而写的。他们用木标插进她的阴部，割去她的两乳，然后用棉花包扎她的全身，注上火油，当“天灯”点，其手段之残暴酷毒，实无以复加！敌人无法收殓，就用货车把残骸运送到郊外去掩埋。这首诗的底稿，国内已无法寻得。据当时留学日本的同乡杜镇奎同志来信告诉我们，这诗早已被上海“内山书店”的人译成日文，刊登于日本刊物上。除创作外，灵菲同志还翻译过高尔基的《童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

在西门里住过了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为了工作的方便，也为了逃避法租界每晚对行人的搜查，（这对于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来说，很为不利。）夏初灵菲同志和我，一道从西门里搬到北四川路“奥迪安”电影院旁边的鸿庆坊，租了一间亭子间。这时我已怀孕，行军床太小，无法挤下两个人，只好到旧家具店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锯了上半节的双层床，和一张旧书桌、一把椅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

一九二八年秋天，杜国庠同志由香港逃难到上海，我和灵菲同志、戴平万同志都搬到北四川路东武昌路口春江里54号。这里只有两层楼房，楼下住的是一位姓谭的资本家和他的太太、两个孩子、一个保姆。二楼住的是一位洋行职员和他的妻子，我们称呼她林少奶奶，和一个八、九岁的丫头，据说是他们的佣人。现在他们便是我们的房东。我们租了他们两间房子，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宽，后厢房很大，可放三、四张单人床，摆三张桌子；一

张是平万同志的书桌，一张是杜老的书桌，中间一张饭桌。

我和灵菲同志住的是前后房中间的一间厢房，大约有十一、二平方米宽，除一床、一桌、一椅外，我们添了一张单人铁床，待孩子生下来后，灵菲同志可以一个人睡在那里，不至于妨碍他的工作和学习。

搬到这里以后，有组织关系的文化界人士，来往更多了，有时说不定要在这里开个会，研究一些问题。灵菲同志每天一早就起来写作，白天接待同志们。平万同志喜欢在晚上，更深夜静的时候写作。杜老搞日文翻译，多半在白天和晚上。这三人都 有稿费收入，其中要算灵菲同志的收入最多。他写的快，每天早上四到六点两个小时左右，他都能够完成五千字的任务，书店也最欢迎他的稿子。同志们一个个见到灵菲同志，就拥抱他，表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杜国庠同志也认为灵菲同志年青有为，很佩服他。

现在需要我们接济的同志也渐渐少了，有的派了工作，有的调到地下党机关去。我们的生活也就慢慢地宽裕起来，请了谭家的保姆来做饭、买菜、洗衣服和照顾我坐月子，因为她不愿意在谭家干活，我们便把她请来了。这人很忠厚诚实，很适合我们做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二十岁结婚，生下一儿一女，丈夫就去世了，今年才二十三、四岁，为了生活，出来帮工。据说谭老板对她还不错，太太有点醋意，她就不想再干下去了。她看到我们这里人虽多，活路不重，一个个和颜悦色，没有架子，心地也好，她便乐意到我们这里来。这时已是深秋十月，我眼看就要分娩，不请人帮忙是不行了，便答应了她。她真是事事都为我们着想，买菜、做饭一点都用不着我们操心，每天起早摸黑地手脚不停。灵菲同志怕她太累，老劝她休息，她只笑着说：“没事，